

潘美月 · 杜潔祥 主編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3冊

《四庫全書》之纂修與清初崇實思潮之關係研究  
——以經史二部為主的觀察

曾紀剛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四庫全書》之纂修與清初崇實思潮之關係研究——以經史二部為主的觀察／曾紀剛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民94〕

頁 1 + 173 頁；19×26 公分（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編；第 3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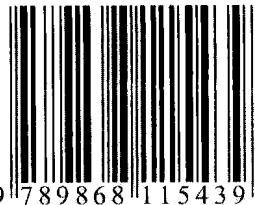
ISBN : 986-81154-3-4 (精裝)

1. 四庫全書 - 研究與考訂 2. 學術思想 - 中國 - 清 (1644-1912)

112.7

94018878

ISBN 986-81154-3-4



9 789868 115439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編 第三冊

ISBN : 986-81154-3-4

《四庫全書》之纂修與清初崇實思潮之關係研究  
——以經史二部為主的觀察

作 者 曾紀剛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發 行 人 高小姐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市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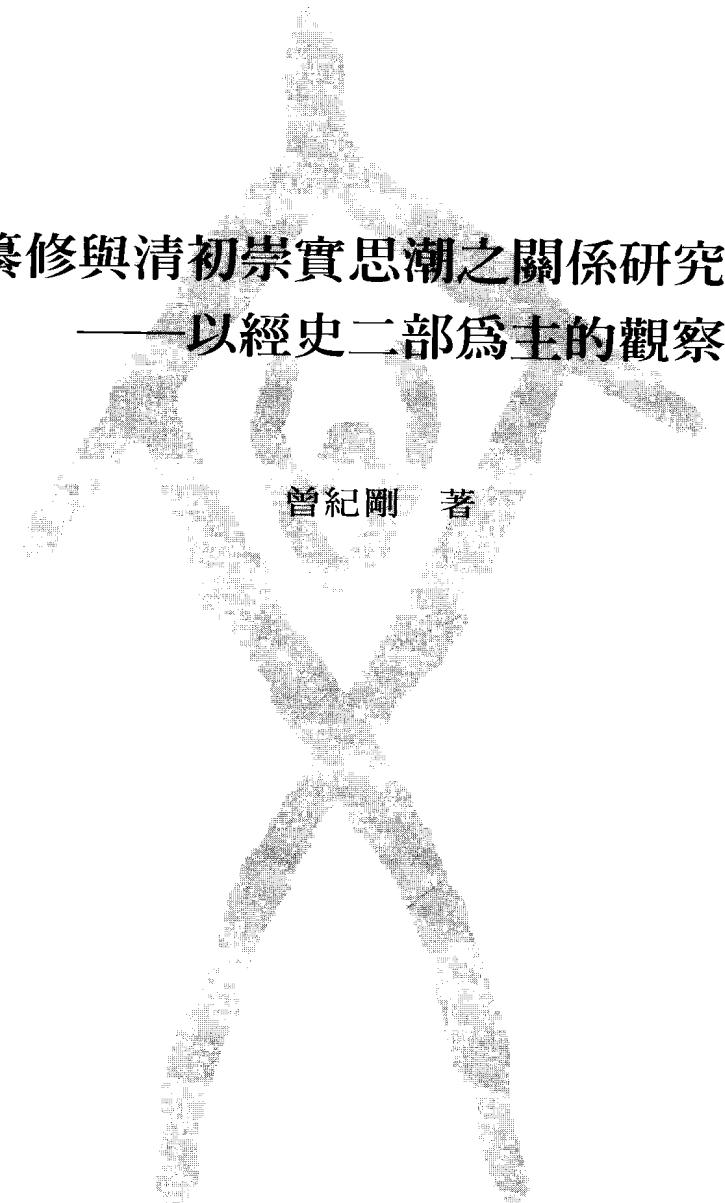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5 年 12 月

定 價 初編 40 冊 (精裝) 新台幣 6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四庫全書》之纂修與清初崇實思潮之關係研究 ——以經史二部爲主的觀察

曾紀剛 著

## 作者簡介

曾紀剛，湖南省武岡縣人，1976年生於臺南市。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1998）、碩士（2002），1998年獲趙廷箴文教基金會全國中文系所特優學生獎學金，2004年考入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兼任北台科學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講師。研究方向為文獻學與清代學術思想。

## 提 要

本文針對清高宗纂修《四庫全書》此一文化工程與清初崇實思潮之間的關係進行探究。首先回顧多種思想史、哲學史以及學術史類的研究論著所陳論的清初學術轉衍脈絡，可以看出崇實黜虛的學術理念與知識品味，實是明清之際乃至漫衍於整個十八世紀學術思想形態的一大轉向；此一思潮與轉向得到學者以不同偏向與程度的普遍關注，同時可見在眾多史類論著中此一議題發展所遭遇的侷限。其次，以康、雍、乾三朝《聖訓》與《實錄》所載聖諭為基本材料，著眼於乾隆朝所擘畫推行的文教政策，從幾個措施面相討論崇實精神貫注於制度語境的影響脈絡。之後，進入《四庫全書總目》對於傳統知識文化的重構工程與再現體系，以經部與史部作為主要的觀察對象，先就《總目》的小序系統析論其著錄準則與思想取向的大體趨勢暨其異趣，再以提要當中的評論措辭作為一種精神或思想徵狀的閱讀理解，考求並論證四庫館臣在詮釋所面對知識對象的同時，如何呈顯其以「崇實」為群體共識的圖書擇存內涵與學術批評意態。本文認為，崇實精神是透過多面相與多層次的散射方式，進入經部與史部的學術批評場域之中；從人品學養、著作內涵、時代學風、知識指向等宏觀的體探，以至於研究方法、取材觀點等細部考察。作為一種思想文化的集體再現表徵，崇實精神堪稱纂修《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總目》的思想基調，並藉《全書》與《總目》為文化傳播與流動的載體，將深蘊其中的價值內涵浸滲入建構思想世界與知識秩序的核心，不斷散放其暢通文化生命、形塑理想社會的豐沛能量。



#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二章 想像與再現： 論四十五種學術論著中的「清初」論述 .....	7
第一節 十五種「思想史」對於「清初思想」的陳論 .....	8
第二節 二十三種「哲學史」對於「清初哲學」的陳論 .....	18
第三節 七種「學術史」對於「清初學術」的陳論 .....	30
第三章 乾隆時期強化崇實觀念的幾個面相： 從上諭檔略論清高宗「崇實黜浮」的文教精神 .....	37
第一節 對教育宗旨的揭示 .....	37
第二節 對科舉現象的檢討 .....	42
第三節 對經筵講論的期許 .....	50
第四章 《四庫全書總目》經史二部的著錄取向 .....	55
第一節 經部小序系統所標舉的著錄準則 .....	56
第二節 史部小序系統所反映的著錄取向 .....	66
第五章 經史二部提要的措辭與崇實內涵的呈顯 .....	79
第一節 「徵實不誣」的研經內涵 .....	79
一、「篤實」與「淳（醇）實」 .....	79
二、「實行」與「實用」 .....	86
三、「切實」與「實際」 .....	88
四、「徵實」 .....	90
五、「實學」 .....	91
六、其 他 .....	93
第二節 「務切實用」的經世史學 .....	95
一、「實用」與「實行」 .....	95
二、「切實」與「近實」 .....	105
三、「摭實」與「得實」 .....	111
四、其 他 .....	115
第六章 結論 .....	121

## 附 錄

一：兩岸四庫學研究論著目錄簡編（2000.03～2002.02） .....	125
二：《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提要崇實措辭匯表 .....	129
三：《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提要崇實措辭匯表 .....	149
參考書目 .....	165

# 第一章 緒論

《四庫全書》的纂修是中國古代帝王所推動最具規模的叢書徵集工程，而《全書》的纂成暨《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考證》、《簡明目錄》、《分架圖》等配件的相繼纂編再加上南北七閣的抄副貯藏，則共同造就了歷史上卷冊編制最為龐大、裝潢體式最為精緻的官方叢書。《四庫全書》以四部四十四類六十六屬的部次體例，著錄圖書 3471 種（若包含「存目」書籍則在萬種以上），精抄為 36381 冊〔註 1〕，不僅匯聚了傳統文化的精萃，並且藉學術精英的眼光重構了中國古代知識世界〔註 2〕，更由於纂修背景的特殊與關涉因素的複雜，使得《四庫全書》以及具體反映書籍著錄思想與學術內涵的《四庫全書總目》，承載、糾結了至為豐沛的意義詮釋能量與文化論述網絡。

正因如此，《全書》與《總目》在編纂竣工當時即引起學界廣泛迴響，之後便有學者致力投入糾補與批注的研究工作，而隨著時序的推移、材料的累積與論題的延展，遂逐漸醞釀出專門而系統的「四庫學」意識與倡議，更陸續有學者撰述「四庫學」研究史的發展回顧與前瞻展望，如劉兆祐〈民國以來之四庫學〉〔註 3〕、楊

〔註 1〕這是採用吳哲夫先生對各部類之統計數據加總而得。詳見《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 79 年 6 月）第四章〈四庫全書之編輯〉第三節〈部次圖書體例之建立〉，頁 117～120。

〔註 2〕吳哲夫先生〈四庫全書所表現的傳統文化特色考探〉（載於《故宮學術季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第 12 卷第 2 期，民國 83 年冬季，頁 1～20）一文即指出：「四庫全書收錄中國古代重要典籍於一堂，不但對收錄的每一種往著保存全文，更以系統的分類法將歷代學術著作，部勒得井井有序，可以說是一部以叢書體裁表示出修纂當時中國知識界所認知的文化整體，……」。

〔註 3〕載於《漢學研究通訊》（臺北：漢學研究中心）第 2 卷第 3 期，民國 72 年 7 月，頁 146～151。收入劉著《中國目錄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 87 年 7 月），頁 273～289。

晉龍〈「四庫學」研究的反思〉〔註4〕、昌彼得〈「四庫學」的展望〉〔註5〕以及周積明〈「四庫學」通論〉〔註6〕。其中，楊晉龍先生所論研究態度的檢討與研究策略的轉移，以及周積明先生進一步的思想詮釋與理念鋪陳，則格外引人注目且發人深省。楊先生論云：

「四庫學」研究者必需承認滿懷偏見的去「譴責歷史事實」，不如平心靜氣，比較客觀地「用心去瞭解歷史事實」，從客觀的「瞭解」中所獲得的結論，相信比消極地「譴責怪罪」而獲得的暫時性的「自我滿足」，更有價值、更有意義。……研究者應先去除上述諸弊，客觀、冷靜的直接面對《全書》或《總目》，瞭解它的價值與意義，不可再停留於譴責式的研究層面，……建議改變研究的方式，直接從《全書》和《總目》內容的「瞭解」上著手，目的是突顯兩者本身內在的意義和價值。亦即放棄「政治史」的研究觀點，改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研究〔註7〕。

周先生論云：

如果按照研究類型劃分，「四庫學」似可分為有機聯繫的三大部分，其一為「四庫學」的文獻研究；其二為「四庫學」的史學研究；其三為「四庫學」的文化研究。……「四庫學」的文化研究則主要研究《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總目》的知識本質、價值趨向、文化觀念及其恆久性的價值。……「四庫學」的文化研究是「四庫學」中最薄弱的部分，故研究空間也特別廣闊〔註8〕。

〔註4〕載於《中國文哲研究集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第4期，1994年3月，頁349～394。

〔註5〕載於《書目季刊》第32卷第1期，頁1～4。收入《兩岸四庫學——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87年9月），頁i～vi。

〔註6〕載於《故宮學術季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第17卷第3期，民國89年春季，頁1～21；又以〈「四庫學」：歷史與思考〉發表於《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頁50～62。收入周著《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10月），附錄，頁265～293。

〔註7〕詳見〈「四庫學」研究的反思〉，頁390～391。至於楊先生所論「放棄政治史的研究觀點」，應可理解為透過研究策略的轉離（政治史的）與轉向（文化史的），調整以往過度偏重的考量因素與既定成見，方能深掘細繪《全書》與《總目》的文化價值與意義；所謂的「放棄」，並不代表對於某些觀點或考察角度的推淨與隔離。又，作者為深刻闡述這種研究取向的意義，另撰〈《四庫全書》訂正析論：原因與批判的探求〉（收入《兩岸四庫學——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37～373），從「君師牧民的責任」、「理想士民的要求」與「典籍內涵的選擇」三方面探討清高宗纂修《四庫全書》暨其刪禁書籍的「教化」意義。

〔註8〕詳見《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頁290～292。

吳哲夫先生更明確指出纂修《四庫全書》的文化質素：

四庫全書的纂修，固然有許多清室特殊的目的參雜其中，但從文化發展史的角度來觀察，一項大規模文化活動的出現，往往有一種文化趨向作為深層的活動力〔註9〕。

而概觀周積明〈「四庫學」通論〉發表後的兩岸「四庫學」研究，仍較致力於文獻研究一途〔註10〕。

本文之寫作，則希望從文化趨向的角度，直接面對《總目》進行意義的理解，間或探求其中意義生產的相關操作因素與方式。然而，文化趨向的研究取徑並不是以文本對象的意義轉述為最終的目的或滿足，它必須「突破文本邊界的限制，建立起文本與價值觀、風俗、實踐等諸文化要素之間的聯繫」〔註11〕；也就是說，閱讀與研究的觀照範圍，應當涉及《總目》編撰當時的社會價值觀與學術語境，讓詮釋主體處身於辯證的位置進行對話與思考。因此，本文選擇較能凸顯清初學術主流與價值趨向的「崇實」思潮，作為將思想文化導入《總目》意義考掘的施力點與銜接對話空間的介面，並且藉由乾隆時期部分文教政策之精神作為導入的角度與路徑。

必須說明的是，面對明末清初這股由「虛」返「實」的學術論述轉折與時代思潮湧現，許多學者好以「實學」此一名詞概括，並特意強化與鼓吹所謂「實學」研究在思想史上的「啓蒙」意義。然而，「實學」究竟可以統整或發展為具有理論基礎與系統脈絡的專門學理論域，或者就是一種治學理念、思想傾向與價值觀點的學術泛稱？則更有學者持傾向保留乃至否定專名化的立場與理據〔註12〕。本文採納姜廣輝〈「實學」考辨〉一文之論見，認為：一、「『實學』不僅不是一個學派，也不是一

〔註9〕詳見〈四庫全書所表現的傳統文化特色考探〉，頁18。

〔註10〕由「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系統」與「中國期刊網」查見兩岸學者所持續推出的研究成果（詳見本文「附錄一、兩岸四庫學研究論著目錄簡編 2000.03～2002.02」），可以明顯察覺此一研究趨向。至於在學位論文當中，唯見中國武漢大學司馬朝軍之博士論文〈四庫全書總目研究〉，與臺灣暨南大學龔詩堯之碩士論文〈四庫全書總目之文學批評研究〉，分別對《總目》進行全面性的學理考論與專門性的內涵理解。

〔註11〕參考《文學批評術語》(Frank Lentricchia, Thomas McLaughlin 編；張京媛等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310。

〔註12〕可參考姜廣輝〈明清實學研究現況述評〉、張壽安〈乾嘉實學研究展望〉與林慶彰〈「實學」概念的檢討〉，皆載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第2卷第4期，1992年12月，「明清實學研究的現況與展望」專輯。姜廣輝另撰有〈「實學」考辨〉一文（收入《走出理學——清代思想發展的內在理路》，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5月，頁27～53），對於「實學」概念所涉及的歷史內涵、意義界說與理論觀點等相關問題有周詳而深入的辨析。鄭宗義《明清儒學轉型探析——從劉蕺山到戴東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七章第三節〈附論「實學」之實義〉，頁183～185。

個學科或學術型態，只能算是一種學術取向」；二、「『實學』一詞本身並沒有『啓蒙』等許多意義，因此用『實學』來概括明清思潮也就未必合適」；三、「『實學』的歷史內涵是通經、修德、用世三項」（註13）。秉此，本文內容亦將探求《總目》對於「實學」之歷史內涵的具體呈顯，而不取「實學」之名。

此外，因限於論文撰寫時限與學力、篇幅等因素考量，本文對於《總目》實際內容分析僅取經部、史部為主要對象，確實未能顧及全面知識體系與崇實內涵之呈顯。不過，從乾嘉大儒段玉裁（1735～1815）所論以經史為「有用之書」（註14），晚清張之洞（1833～1909）等人奏辦學堂之章程中亦倡言「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註15），可以見得清代學術界對於經學與史學的高度重視。而對於清朝官方而言，經學作為建立政權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史學作為政治話語積極涉入的詮釋場域，經史之學作為皇權對於學術真理徹底壟斷與兼併的重要據點，從《總目》對經、史二部書籍的著錄與評議，也應當能夠反映此一意義文本鑲嵌於特定的歷史文化脈絡中所展示的教化指向，具有其象徵與代表意義。

本文概分為六章進行討論：除首、末章緒論、結論以外，第二章〈想像與再現：論四十五種學術論著中的『清初』論述〉，藉由回顧的方式整理多種「史」類研究論著中所陳論的清初學術轉衍脈絡，可以看出崇實思潮受到學者關注的偏向與程度，同時可見此一議題發展所遭遇的侷限；第三章〈乾隆時期強化崇實觀念的幾個面相：從上諭檔略論清高宗『崇實黜浮』的文教精神〉，以康、雍、乾三朝《聖訓》與《實錄》所載聖諭為基本材料，著眼於崇實精神在統治者制定與推行政策時的參與面相，以及貫注其中的影響脈絡；第四章〈《四庫全書總目》經史二部的著錄取向〉，從《總目》的小序系統析論經部與史部著錄準則與思想取向的大體趨勢暨其異趣；第五章〈經史二部提要的措辭與崇實內涵的呈顯〉，以詞頻統計的結果，將提要中的評論措辭作為一種精神或思想徵狀的閱讀理解，考求四庫館臣在詮釋所面對的知識對象的同時，如何呈顯其以「崇實」為群體共識又切合官方教化需求的學術內涵與意態。

最後，本文撰寫過程中得力於電子資料庫甚多，如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

[註13] 詳見《走出理學——清代思想發展的內在理路》，頁48～51。

[註14] 段玉裁〈與外孫龔自珍札〉云：「……萬季楚之誠方靈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作無益之文。』嗚呼！盡之矣。博聞強記，多識畜德。努力為名儒、為名臣，勿願為名士。何謂有用之書？經史是也。」收入《經韻樓集》卷九。詳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集部別集類，冊1435，頁100。

[註15] 詳見劉錦藻撰《清朝續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6年），卷一百九〈學校考〉載：「至於立學宗旨，無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俾學生心術壹歸純正。而後以西學渝其智識、練其藝能，務期他日成材，各適實用，以仰副國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

獻」、「歷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臺北故宮博物院「宮中檔及軍機處檔摺件檢索系統」、「寒泉古典文獻全文檢索資料庫」等等（連結位址詳見參考書目）。在此謹向各資料庫建置人員致以深摯謝意。



## 第二章 想像與再現： 論四十五種學術論著中的「清初」論述

本文在進行研究與撰寫的過程中，首先必須面對的問題，即歷順治、康熙、雍正三朝統稱「清初」時期學術思想的總體發展脈絡，其次才能夠延續至乾隆朝進一步處理以特定思想取向或價值觀點作為主軸的相關討論，並進而與纂修《四庫全書》的文化工程暨《總目》對於傳統知識世界的再現相互銜接、對話。因此，在我的學習、研究基礎與知識經驗當中，清初的學者、著述，與其共同形構的學術景觀，便成為亟待重整、釐析的模糊斷層。又，知識乃至於學術的生產、運用、傳遞、紀錄，「人」在其中佔有優勢與關鍵意義的位置。因而後人期望認識或研究某一時空區段的學術活動與發展脈絡，歷史文獻的載記應可作為初步的線索與介面。

於是，若以《清史稿》的〈儒林傳〉與〈文苑傳〉<sup>(註1)</sup>、《清代碑傳全集》<sup>(註2)</sup>、以及蕭一山(1902~1978)《清代學者著述表》<sup>(註3)</sup>作為資料檢索的依循對象，經過初步的考察，檢出在順治、康熙、雍正三朝活動之學者（不論其是否奉清之正朔），約有四百餘人。這些資料，在不同的面相上局部反映了學者與社會政治之間的關係、學者與知識社群之間的關係，以及自我的學術沿襲、著述……等現象。如能將之作系統化的序列與繫聯，則所謂「清初學術」必將粲然大備。然而，如此龐雜的文獻整理甚至分析研究，絕對有其實行上的阻難窒礙，絕大多數從事清代學術相關論題之研習者，亦不勝擔荷如此耗時費力的前置作業。因此，數種以「史」為名，

[註 1]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新店：國史館，民國 79 年 2 月)。〈儒林傳〉在卷四八七至四九〇，〈文苑傳〉在卷四九一至四九三。

[註 2] 陳金林、齊德生、郭曼曼主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內含：(清)錢儀吉編《碑傳集》、(清)繆荃孫編《續碑傳集》、閔爾昌編《碑傳集補》及汪兆鏞編《碑傳集三編》。

[註 3] 重慶商務印書館，民國 32 年。

在大量的文獻資料中作出系統化、概念化、精粹化的學術研究著作，似乎成為我們窺探「清初學術」的入門工具甚至關照眼界的框架、範型了。

本章作為論文陳論的起點，即欲就多種以「思想史」、「哲學史」與「學術史」為名的著作，針對其標明「清初」或「清代」的章節，概略地討論它們所共同堆疊、凝聚的清初學術「論述（discourse）」（註4）。牽引我思考這個問題的動機及此處所要提問的是：論者基於何種立場，選擇哪些人物、觀念作為置入其「想像」（刻意甚至強迫的記憶與遺忘）「清初」的藍圖之中？「史」的論著作為對清初學術的「再現（representation，或譯作「表述」）」，經過讀者的接受與理解，更有可能轉變成一種因再度複製而消解了直接性與真實性的知識經驗（註5），這種知識經驗的建立對於討論學術議題的延展性與深刻性，可有其助力與阻力？

本章所選取這些學術論著的範圍與條件，是以民國成立作為時間界限，以臺灣、香港、中國大陸等三個漢文書寫區域為主要空間。至於研究中國學術亦不遺餘力的日本學者著作，則因個人語言能力之限制，僅採用有中譯本者。若著作內容對本章討論清初學術思想之再現無法提供適當線索、資料，或同一作者有相似性較高的其他作品，則不予採用或擇其代表作論之。

## 第一節 十五種「思想史」對於「清初思想」的陳論

本節所引用作為討論對象的思想史著作，依其「初版」的印行年代排序，分別

[註 4] 中文學界對“discourse”有不同的譯解，如「話語」、「論述」、「言說」……等，本文行文採用「論述」，但保留引文當中原譯者之譯解。Diane Macdonell 在《言說的理論（Theories of Discourse: An Introduction）》（陳樟津譯，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 2 月，新版一刷）一書中對「論述」作了一個基本概念的揭示：「對談（dialogue）是言說的首要條件：一切言說和書寫（writing）都是社會的。在國家裡頭和跨越國界，言說都不同。……言說隨著言說在其裡頭成形的各種制度設施和社會實踐之不同而有所不同，也隨著那些說話的人的立場和那些被他們說教（address）的人們的立場之不同而有所不同。……言說是社會的。做這種陳述、使用這些詞語和這些所使用的詞語之意義，完全取決於在什麼地方做這樣的陳述，又針對著什麼而做這樣的陳述。」（頁 11～12）

[註 5] 如果我們依循著米切爾（W.J.T. Mitchell, 1942～）對「再現」的理解：「每一個表述都必須付出代價，以其失去直接性、存在或真理的形式，以其在意圖和實現，原本和複製之間建立一種鴻溝的方式。……」（詳見《文學批評術語》，頁 26）應當不難理解，個別的思想家或複雜的學術群體在經過論者精神自由的篩選、重建而得以聯繫成為一種狹義的「歷史」（或許可以稱之為層層剝削之後的歷史），最後讀者所能夠從中汲取的，將會是多麼稀薄的成分。

是：

初 版	編、撰、譯者	書 名	出 版 者	參 考 版 本
1936	武內義雄著、 汪馥泉譯	中國哲學思想史	新竹：仰哲出版社	民國 71 年 9 月
1940	譚丕模	清代思想史綱	臺北：開明書店	民國 36 年 4 月
1952	錢穆	中國思想史	臺北：聯經出版社	民國 83 年
1952.3	加藤常賢等著、 蔡懋棠譯	中國思想史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民國 67 年 5 月
1956.8	侯外廬主編	中國思想通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 年 1 月
1962.5	楊榮國主編	簡明中國思想史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1962 年 5 月
1963	侯外廬主編	中國思想史綱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1 年 5 月
1967	赤塚忠等編著、 張昭譯	中國思想史	臺北：儒林圖書公司	民國 70 年 4 月
1972	林夏	中國思想史	臺北：作者自印	民國 61 年 6 月
1978.3	陸寶千	清代思想史	臺北：廣文書局	民國 67 年 3 月
1979	韋政通	中國思想史	臺北：水牛圖書公司	民國 84 年 10 月
1989.6	張豈之主編	中國思想史	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	1989 年 6 月
1990.8	何兆武等	中國思想發展史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0 年 8 月
1993.12	朱葵菊	中國歷代思想史清代卷	臺北：文津出版社	民國 82 年 12 月
1994	張越	中國清代思想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4 月

在這些著作之中，顯然可以即時察覺的，大多是以通史的方式規劃其內容，但也有些藉斷代史的體制，針對特定的時間區段闡述其思想內容，如譚丕模《清代思想史綱》、侯外廬《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陸寶千《清代思想史》以及張越《中國清代思想史》。由於這種關照視野與取材鋪敘之專博詳略的不同，如果要對它們進行內容上的討論甚至分析，應該也可以略作區分。以下，我將先就通史式的思想史著作，取其中論「清代」或「清初」思想的部分，嘗試討論學者們如何「想像」與「再現」清初時期的學術圖像。

錢穆的《中國思想史》是中文學界中最早成書的中國思想史，或可說是最為精要彙略的（註6）。此書對整個清代思想的述說，僅選取了王夫之（1619～1692）、顏元（1635～1704）、戴震（1723～1777）與章學誠（1738～1801）四人，王夫之與顏元則為清初思想界的代表。其論王夫之，以宇宙論與心性論為中心；論顏元，以其對程朱、對宋儒的思想反撲與理想境界之構設為主旨。而王、顏二人，則皆為賓四先生口中惜其「更無嗣響」（註7）的大家。基於錢先生選擇王夫之、顏元述說清初之思想，又感嘆其學之不傳，試推揣其作意，也許錢先生所想像抑或寄望的清初乃至於整個清代學術的開創與延展，即為此輩晚明諸儒帶出「從個人轉嚮於社會大群，由心性研討轉嚮到政治經濟各問題。由虛轉實，由靜返動。由個人修養轉入群道建立」的新氣象，而一切竟為清代的高壓政權所扼殺，並轉成經籍考據訓詁的畸形了（頁232）。

侯外廬主編的五卷本《中國思想通史》，可說是早期最具規模的以通史形式寫成的中國思想史。這部思想史的第五卷——《中國早期啓蒙思想史》（註8）——由侯外廬本人執筆，即是對明末清初至清代中葉啓蒙思想的研究，在整部《中國思想

[註 6] 一如賓四先生在此書〈例言〉第二、三條所言：

二、每一時期只提及主要的幾家，每一家各只提及主要的幾點。其餘都略去了。因  
之此書只能提供出中國思想史裏幾個主要節目，並非中國思想史之全貌。  
三、每一思想家之生卒年代及其師友淵源，生活出處，以及時代背景，均為研究思  
想史者必須注意之項目，但此書因限於篇幅，都略去了。

[註 7] 見錢穆《中國思想史》頁248：「習齋之學，一傳為李恕谷，惜乎也更無嗣響。河北  
顏、李，一樣如湘中船山之學般，響絕音沉了。」

[註 8] 這部《中國早期啓蒙思想史》其實是以侯外廬早在民國33年結撰的《近代中國思想  
學說史》為底本，兩者的差異大概只在於綱目編排的名序以及表述語意的顯晦而已  
(這些差異點，作者在《中國早期啓蒙思想史》1955年的自序中也有說明：「我在抗  
日戰爭時期寫了一部《中國近代思想學說史》。這是其中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的  
部分，經過補充修訂，單獨成書，改名為《中國早期啓蒙思想史》。……我的這部舊  
作基本上是一種讀書筆記，結構不夠謹嚴。寫作的年月又正當國民黨反動派第一次  
反共高潮的時候，好多問題只好以心照不宣的方法來處理，所以材料雖多，而說明  
卻是簡略的。」)。如改編後的《中國早期啓蒙思想史》是以王夫之、黃宗羲、顧炎  
武、朱之瑜、傅山、李顥、唐甄、顏元的順序分章陳論十七世紀的啓蒙思想，而《近  
代中國思想學說史》的構想則是先以專章分論王、黃、顧、顏，將〈首創諸子研究  
的傅青主〉與〈折衷體用二元的李二曲〉置入〈中國第十七世紀的西北思想家〉一  
章；將〈近世中國第一位流亡儒者朱舜水〉與〈十七世紀的政論家唐鑄萬〉置入〈清  
初的西南學者與流亡學者〉一章。在內容方面，《中國早期啓蒙思想史》是在《近代  
中國思想學說史》的基礎上填入了更多以階級鬥爭與唯物主義觀點為程式的申論，  
若能詳加比對，自然可以攫獲更豐富的訊息。這種修訂改寫前後的結果一旦與各自  
成書的時間背景相連結，內含於複雜外緣因素底下的書寫動力與其所能引發的多元  
聯想，恐怕更耐人尋味了。

通史》的編排中成為一個自立系統、相對獨立的分卷〔註 9〕。作者顯然積極地將時代思潮的描繪與社會、經濟、意識型態……等環節相勾連，而《資本論》、《共產黨宣言》、〈十九世紀末期俄國底土地問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自然辯證法》……等等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列寧(Vladimir Ilich Lenin, 1870~1924)、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等人的經典教條，也無疑成為作者想像與再現此一時期思想史的根本立場〔註 10〕，甚至內化為規劃、操縱其方法論的「超穩定結構」〔註 11〕。其次，作者是以自然時間作為規劃內容的準則，在十七世紀——亦即明清之際——的單元列入討論的「啓蒙」學者，包括：王夫之、黃宗羲(1610~1695)、陳確(1604~1677)、潘平格(約 1610~1677)、顧炎武(1613~1682)、朱之瑜(1600~1682)、傅山(1607~1684)、李顥(1627~1705)、唐甄(1630~1704)、顏元、李塨(1659~1733)等十一人。而清代從康熙、雍正至於乾隆三朝，則被劃歸入「十八世紀的啓蒙思想」，並以戴震、汪中(1744~1794)、章學誠、焦循(1763~1820)、阮元(1764~1849)等人為主要對象，進行所謂「專門漢學」的討論了。

同樣是由侯外廬主編的《中國思想史綱》〔註 12〕，延續了《中國早期啓蒙思想史》的主要論點，規劃〈清初早期啓蒙思潮〉一章，以方以智(1611~1671)、王夫

〔註 9〕侯外廬在 1956 年為增訂本《中國思想通史》所寫的總序中已經作出說明：「這部書共分四卷。第一、二、三卷是就解放前編寫的《中國思想通史》增訂修改而成。……本來有第五卷封建解體的一段，即自清初十七世紀以至清中葉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因為它已經單獨以《中國早期啓蒙思想史》一書分開出版，所以本書僅編到明代末葉為止。」儘管如此，日後再版的《中國思想通史》仍舊存在「第五卷」的編制，並同時加註《中國早期啓蒙思想史》的獨立書名。又由於這部思想史的規模與內容，在推出之後便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因此我也希望將它置入通史類的思想史著作群中討論。

〔註 10〕如同侯外廬在 1955 年為修訂本《中國早期啓蒙思想史》所寫的自序中明示：「中國豐富的哲學遺產必須依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作出科學的總結。」

〔註 11〕「超穩定結構」是金觀濤、劉青峰二位中國學者，面對中國封建社會體制得以長期延續原因的深刻反省，並借用艾什比(William Ross Ashby, 1903~1972)的「超穩定系統」(Ultrastable system)理論，藉以描述中國封建社會週期性和停滯性之間的內在聯繫，以及中國封建社會結構中經濟結構、政治結構、意識型態結構三者的相互作用對於形成超穩定機制所透顯的意義。詳見金觀濤、劉青峰合著《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臺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民國 83 年 4 月)。在此我則希望以「超穩定結構」這一名詞及部分概念，來比喻大部分早期中國學者在面對古代文化並進行詮釋、形成論述的同時，歷史唯物主義與階級鬥爭概念似乎已經成為內含於其中並且輔成這種集體想像的「超穩定結構」。

〔註 12〕本書 1963 年第一版題名為《中國哲學簡史》，1980 年北京第二版始改名《中國思想史綱》。